

【运气学说】

五运六气研究中关于干支纪年若干问题的讨论

柯资能¹, 顾植山²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安徽 合肥 230026;

2.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8)

摘要: 史书对西汉太初元年有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记载, 引起学者对五运六气理论科学性的质疑。结合文献考证和天文模拟, 提出秦颛顼历以亥为岁首而年名减一位, 说明其基础正是连续到现在的干支纪年, 太初元年“岁在丙子”是依颛顼历以公元前 105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而“岁在丑”则是太初改历后以公元前 104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至于《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问题, 是司马迁采用了太阴纪年的缘故。干支纪年并不起源于岁星纪年, 因而“岁星超辰”问题与纪年干支无关, 这样就化解了五运六气学说中两个被人认为的致命矛盾。

关键词: 五运六气; 干支纪年; 岁星纪年; 太初历

中图分类号: R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05)06-0412-02

1 太初元年不同纪年引出的问题

五运六气是以纪年干支作为主要运算工具的一种学说, 故年干支对于运气推算具有决定性意义。若纪年干支出现分歧, 运气分析就没有了标准。由于史书对西汉太初元年有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记载: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己詹, 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 年名焉逢摄提格。”焉逢摄提格对应的干支是甲寅, 而班固《汉书·律历志》谓太初元年“岁在丙子”, 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又说“太初元年, 岁在丑”。学者指出:“如果按照纪年干支来推算和预测气象, 那关系就非同小可。就以太初元年的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来说, 甲寅年气象变化的要素为土运太过, 少阳相火司天, 厥阴风木在泉; 丙子年则为水运太过, 少阴君火司天, 阳明燥金在泉; 丑年则为木运不及, 太阴湿土司天, 太阳寒水在泉。同一个太初元年, 可以推算出三种截然不同的气象变化, 这就表明以干支纪年推算和预报气象……在理论上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若是企图从中寻找干支纪年与气象变化之间的特定关系, 并以之作为评价运气学说科学性的依据, 则不论其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都难以令人信服。^[1]”这确实是一个要害问题。若不把这一沿续了 2000 多年的谜团解开, 五运六气理论的科学性研究就无从谈起。

2 太初元年“岁在丙子”的来历

历史上秦行颛顼历, 该历法以亥月为岁首。西汉初年沿用秦历, 至汉武帝时命“落下闳运算转历”, “其更以七年(指汉武帝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史称“太初改历”。太初改历的一个最直接的标志就是改元(换岁首), 从以亥为岁首, 改为以寅为首。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时, 原来的岁首在阳历前一年

立冬附近的亥月, 新历的岁首推迟到立春附近的寅月, 这样太初元年变成了 15 个月, 就拥有了两个冬至, 也就是跨越了两个干支年(从公历的角度就是跨越了公元前 105 和 104 两年)。班固《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太初元年“岁在丙子”, 指的是以公元前 105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依据的是颛顼历; 而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谓“太初元年, 岁在丑”, 则是以公元前 104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东汉元和历以此为基础标识纪年干支, 此后未再改换岁首, 故一直沿用至今。

本来《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太初元年“岁在丙子”, 指的是以公元前 105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若误指为公元前 104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就差了一年。有学者在对照研究西汉的灾害性天气与运气学说的关系时发现, 西汉“长达 197 年内发生的 65 次灾害性天气对照, 取得高达 86% 以上符合率”。但同时强调:“《汉书·律历志》的纪年干支与现代通行的不同……只有用现代通行的干支纪年, 可以获得最高的符合率。^[2]”其实只要知道《汉书·律历志》所说的太初元年“岁在丙子”指的是以公元前 105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而并非公元前 104 年 12 月冬至为基准的年, 就会明白《汉书·律历志》的纪年干支与现代通行的并无不同。为什么用正确的纪年干支对照才能获得最高的符合率, 而用搞错了的所谓“《汉书·律历志》的纪年干支”去对照就不行呢? 恰恰证明纪年干支与灾害性气象变化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 用搞错的“《汉书·律历志》纪年干支”进行的统计, 正好起到了对样本的作用。

3 《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问题

“岁在丙子”和“岁在丑”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剩下如何解释《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

问题了。

一些学者曾提出《史记》中的“焉逢摄提格”指的不是汉武帝时的太初元年,而是太初历元的观点,如元代国学大师黄镇成在《尚书通考》卷二中说:“武帝元封七年,岁强圉赤奋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改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宜改正朔,夏五月诏卿遂迁等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则太初元年岁在丑,史记乃作甲寅,下距丁丑二十三年,悬异如此者,乃太史公追纪太初作历之元,非武帝之太初元年也。盖太史公推上古之元,得甲寅岁,其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今元封七年亦以仲冬甲子朔旦冬至,故以丑起元,亦与太古甲寅同耳,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犹以七年为上古甲寅之岁,非元封七年即甲寅年也。^[3]”

今人张汝舟先生进而提出司马迁的“焉逢摄提格”即甲寅年是指周考王十四年(公元前427年)的观点^[4]。但张氏除了根据现代干支纪年法上推公元前427年为甲寅之外,并未提供更多证据。我们对张氏之说进行了天文验算:公元前428年12月26日北京时间8:00冬至,2小时后日月合朔,说明这一天既是冬至又是初一,但这一天的儒略日为1565456,换算为干支则为己酉,与《史记》讲的甲子日差了26天。故以公元前427年为太初元年的猜测并不符合太初元年的天象要求。

太初历元说虽为“年名焉逢摄提格”找到了一种解释的理由,但《史记》明确提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汉书·律历志》也说“元封七年复得焉逢摄提格之岁”,那么元封七年的“太初元年”是否可能与“焉逢摄提格”有关呢?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提到:“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这里所说的岁阴又称太阴,所谓太阴纪年其实是一套关于岁星与年名对应的方法,用于星占目的。

根据《淮南子》和《开元占经》所集的先秦典籍和秦汉纬书可知,先秦星占家对太阴有过一个共识,即岁在星纪右行而同时太阴在寅左行。如《春秋纬》曰:“太阴在亥,岁星居角亢;太阴在子,岁星居氐房心;太阴在丑,岁星居尾箕;太阴在寅,岁星居斗牵牛;太阴在卯,岁星居须女虚危;太阴在辰,岁星居营室东壁;太阴在巳,岁星居奎娄;太阴在午,岁星居胃昂毕;太阴在未,岁星居觜参伐;太阴在申,岁星居东井舆鬼;太阴在酉,岁星居柳九星张;太阴在戌,岁星居翼轸,运之常也。^[5]”

司马迁作为太史官世家,传承专取星占术数传统,在《史记》中留下了太阴纪年的记录也是合乎情理的。

4 太初元年天象验算

为了更好地理解太初元年曾有三个干支的问

题,我们对西汉太初元年的天象运用国外专业天文软件最新版Skymap10.5进行了数据重现。它的精度非常高,远远可以满足我们验算的精确要求。

通过验算发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冬至发生在BC105年12月23日北京时间20点34分20秒,这一天的儒略日数值为1683429,日干支为癸亥,日月合朔发生在24日早上9点多。《史记》所述“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据司马贞《索隐》应为“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与验算结果高度一致。

帛书《五星占》记有:“岁星以十一月与斗晨出东方,其名为困敦(子);其明岁以十二月与虚晨出东方,其名为赤奋若(丑)”,说的就是太初元年的星象。通过计算岁星运动表,根据岁星携日旦出东方之月支为太岁的规定,太初元年前11月(BC105年12月)岁星在斗八度晨现,后12月(BC103年1月),岁星在女末虚初晨现,前者为子月,故称太岁在子,后者为丑月,故称太岁在丑。二者都属于太初元年这个特殊的年内,两个年干支的出现是由于调整岁首造成的。《汉书·律历志》把BC105年底开始的亥月、子月、丑月单立为元封七年丙子,从寅月开始到下一个丑月为太初元年丑,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以亥月为首岁的特殊历法纪年干支比以寅月为岁首的普通历法提前一个干支,正是当年改亥为岁首而做的调整。说明在秦实行以亥为岁首的颛顼历时,其基础正是连续到现在的干支纪年。

5 关于岁星纪年

一般认为,干支纪年来源于岁星纪年,因岁星(即木星)的公转周期是11.86年而不是12年整,岁星在天空的运行每年要走,一次多一点,即经过约82.6年后,岁星就要超1次,因此后世行用的干支纪年已经与岁星无关(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相关条目)。五运六气是以年干支为起点的理论推算,并没有考虑超辰问题,因而有学者认为^[1],由于干支纪年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天文依据,运气学说在起点上也就失去了依托。

其实,所谓观岁星而纪年是一种误解。

今人江晓原、钮卫星计算了《左传》和《国语》所涉及的全部岁星资料,除“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这条资料未知具体年代之外,其他9条岁星天象都有确定年代,通过现代天文学方法进行精确验算,结果大出人们所料,没一条记录与计算结果相符,而且都相差甚远^[6]。很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些岁星天象之间没有超辰,这就意味着其中必有大的观察误差。

本文作者重新计算了《左传》和《国语》所有的岁星纪年资料,计算结果支持江晓原的观点,可见这些言之凿凿的岁星纪年资料都不是实测记录。莫绍揆先生认为,《左传》不用岁星所在以作记年,而只用以占验^[7]。《左传》、《国语》所记载自鲁禧公五年(公元

(下转第417页)

痰浊、血瘀是冠心病的重要证候^[5],关于“痰”证的病因涉及遗传背景层面的研究过去未见报道。我们在研究 ApoE 第四外显子多态性与冠心病痰瘀证候的关系中发现,公认的导致血脂水平升高的危险因子 ε4 在痰证中出现多于瘀证(《中西医结合学报》待发表),而 apoE IE1 G/G 基因型与 ε4 关联密切,在痰证和痰瘀互阻证中的比率明显高于瘀证和非痰非瘀证。G/G 基因型在正常人群中是野生型表型,在冠心病患者中反而增多,推测有可能是因为 G[→]C 的突变减弱了增强子的生物学功能,或者 G/G 基因型与 ε4 有一定的伴随关系,增强了 apoE ε4 的表达而间接与血脂水平变化和冠心病呈相关性。对此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与脂质代谢紊乱相关的基因多态性可能是影响冠心病“痰”的发生和发展的遗传基础,上述结果为我们先前提出的“中医证候多样性及发生频率与特定基因多态性存在某种关联,此关联可能是证候形成与体质类型或先天禀赋差异的分子基础^[9]”的推测提供了初步依据。

致谢:本文作者对 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在工作上提供的方便和支持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Mui S, Briggs M, Chung H, et al. A newly identified polymorphism in

the apolipoprotein E enhancer gene region is associated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nd strongly with ε4 allele[J]. Neurology, 1996, 47(6): 196-201.

[2] Song Y, Stampfer MJ, Liu S. Meta-analysis: apolipoprotein E genotypes and risk for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Ann Intern Med., 2004, 141(2): 137-147.

[3] 崔天益,周新,金文华,等. Gene polymorphism in apolipoprotein E and presenilin-1 patients with late onset Alzheimer's disease[J].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000, 113(4): 340-344.

[4] Keavney B, Palmer A, Parish S, Clark S, Youngman L, Danesh J, et al. Lipid-related genes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4685 cases and 3460 controls: discrepancies between genotype, blood lipid concentrations, and coronary disease risk[J]. Int J Epidemiol, 2004, 33(5): 1002-1013.

[5] 于涛,曹洪欣. 胸痹(冠心病)证候演变规律的临床研究[J]. 中医药信息, 2004, 21(3): 44-45.

[6] 宋剑南,陈果. 论载脂蛋白 E 及其基因多态性与中医痰瘀证候的关系[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2, 24(1): 13-15.

收稿日期: 2005-04-05

△指导老师

作者简介: 欧阳涛(1973-), 女, 江西省吉安市人, 在职博士生, 从事冠心病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上接第 413 页)

前 655 年)到鲁哀公十七年(公元前 478 年)共历 177 年,其间提及的岁星天象全符合干支纪年周期即 12 年 1 周天。说明这些虚托的岁星天象更可能仅仅是从严格遵守 12 周期记年法中依照星岁对照表推导出来神煞“天象”,这种方式在术数著作中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民间的紫微斗数,用的全是星象语言,但所说的则仅仅一些术数占验公式而已,并不是实际可以看见的天象组合。

另外,从天文观测的角度,观岁星而纪年难度很大,而且不具备独立使用的条件。十二次在黄道上有明确的界线,跟 28 宿一样可以看成一种黄道坐标系。在 1 年中岁星通常要跨越两个次,跨越时间在一 年中哪天都有可能,跨界之后还有可能往回跑,而且视运动是变加(减)速度运动。这样一来,岁在某次仅仅与具体的时间点有意义,对于一个时间段来说,其视赤经是不确定的。岁星纪年说认为,先秦典籍为“岁在某某”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用岁星偕日出于东方发生的月份来定年名。但年名甚至要等到岁末才能确定,显然这种规则不可能作为一种具有历日功能的纪年法而存在,只存在于特殊的场合,比

如对过去一年已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星占追释。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所有岁星天象纪年资料都遵守严格的 12 年周期,而无视天文实际。这说明所谓的岁星纪年是先秦星占官员为了解释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以 12 年周期的纪年方法为基础结合具体天象的术数转译,不具有历法纪年功能,干支纪年起源于岁星纪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干支纪年并不起源于岁星纪年,也没有证据表明五运六气学说起源于星占术。

参考文献:

[1] 王玉川. 运气探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144-145.

[2] 王玉川. 运气探秘[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166-167.

[3] 元·黄镇成. 尚书通考[M]. 四库全书·经部.

[4] 张汝舟. 二母室 古代天文历法论丛[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22.

[5]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6] 江晓原,钮卫星. 论“岁在鹑火”不能用于确定武王克商之年[J]. 哈尔滨: 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论文集, 2004. 8.

[7] 莫绍揆. 秦汉及以前古历探微[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6, (1): 48-59.

收稿日期: 2005-03-14